

---

# 让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

——介绍最近出版之三本“南京大屠杀”画册及研究成果

[美] 吴天威

---

一年来,有三本“南京大屠杀”画册问世,都是为纪念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一方面庆祝抗战胜利,另一方面提醒我同胞勿忘死难同胞和“南京大屠杀”这个国耻。首先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7月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图证》,系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宋平领导下,数十位专家的集体作品。全书共295页,图片800余幅。第二本画册为汤美如主编章开沅编译的《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95年7月出版。全书207页,内有100幅图片。第三本是中英文对照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为尹集钧、史撰著,龙多夫曼编辑;南非开普顿圣公会大主教,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迪斯蒙·杜图作“前言”,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史学系教授余英时作序,于1996年由美国芝加哥革新出版集团公司出版。全书319页,约450幅图片。

这三本画册照片之来源多为日本士兵和随军记者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摄,少数为当时留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及记者所摄,大部分已散见各书报,但亦有首次发表的照片。这些照片把南京被日军攻陷后的破坏和凄惨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烧、杀、淫、掠的暴行,作了充分的代表性的具体证明。每张照片都按其性质和时间加以文字的解释。画册中配以当事人的证言和原始资料写成“南京大屠杀”的翔实历史。这样以照片及当事人证言互相配合叙述的“南京大屠杀”,不仅使我们惊心动魄、毛骨悚然,更激起我们无限的愤怒,及对我受难同胞的共鸣,誓为他们

伸冤,讨回人间的公道。

这三本画册虽然都以现场照片及当事人见证,以及原始资料为依据,写出真实完整的“南京大屠杀”为目的,而且都可以说成功的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由于其各自出版的背景不同,如取材、文体、撰写人的训练和志趣自然的影响他们的成品。因此,这三本画册各有其特色,独特的成就,亦稍有不同的价值。不言而喻,这三本画册也会有不同的缺欠或遗漏之处,笔者将尽其所知,忠实简单地把这三本书介绍于下。

《南京大屠杀图证》的“序章”是以“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作标题,追述日本军国主义急剧扩张,发动七七事变,进占平津,开始全面侵华。“终章”的标题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痛击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唤起原日军官兵反省谢罪,并鼓励日本史学家的正义呼声,最后正告日本人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悲剧绝不许重演。本画册的主要内容分六章:第一章“攻占上海,杀向南京”。第二、三两章是“攻陷南京、杀烧淫掠”、第四章“劫后城郊满目疮痍”。第五章为“以战迫降、灭亡中国”,报道日本近卫内阁于1938年1月16日的《日本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象》的声明;在华设立傀儡政府;实行日本全国总动员,扩大战争,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等内容。第六章以“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为题,报道日本投降后,中国受害者的控诉,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罪犯的审判。

本书是以以图证史,以文释图的方法来叙述“南京大屠杀”,其所搜集之资料包括罪行调查、控诉、罪证及审判图片,多为合编本书的三机构所收藏,其中一部分属首次公布,另外收集日本官方文件,私人手记,及日军官兵与记者所摄的现场屠杀照片,以及美国传教士及记者保存的档案、照片和电影片。对于所用资料,无不加以彻底考核证实,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正如编者所期望的,本书不仅为子孙留下深刻了解这段历史的珍贵图象,并且有助于推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南京：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一书的诞生是由于主编汤美如女士与崔明慧女士合作拍摄电影记录片《奉天皇之命》，于各地放映后博得好评，但仍感报道“南京大屠杀”之不足，乃编写此书。本书特色是主要资料来源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及志愿留守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的日记及书札，报道安全区实况，并由当时留居安全区的王英女士撰文描述难民营的生活。本书的另一特色为访问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前日本军人三人。

本书分成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中、日、美三国史学家章开沅、洞富雄、罗慕士分别为文，探讨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暴行责任，及分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背景及当时国际形势。第二部分是南京保卫战。取材谭道平著：《南京卫戍战史话》序，1946年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出版。南京沦陷前，谭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主要负责整理战事汇报，并参与草拟唐生智长官撤退令及突围计划。此文虽属追述，但颇具史料价值。

第三部分为本书之主要部分，选载亲历“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的日记、证言及报道。魏特琳(中文名字华群)女士于1912年来华。1916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创办，她负责该校教育系并辅助校务。“南京大屠杀”期间，襄助费吴生主持难民营，特别是金女大之难民营。难民营于1938年5月底结束，仍有800妇女无家可归，魏教授为她们设立学习班，继续三个月之久。1941年5月返美，翌年逝世。魏保有逐日详书之日记共526页，始自1937年6月至1941年5月。本书选载其1937年12月至翌年2月2日之日记。

马吉牧师的大名于1991年又名噪一时，缘于东西德合并统一后，原东德波茨坦国家档案馆开放，发现在1938年初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给柏林外交部的文件中，有14页英文撰写的马吉当时所摄的电影内容介绍，但原所附之电影片却不见。马吉之子大卫遂交出其所收藏的复本。马吉牧师(1884—1953)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即入哈佛大学神学院。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后，马吉于1912年赴中国传教。在华凡26年，于1938年夏返美。当即在美各大城作巡

回讲演,揭露日军在南京之暴行,战后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后出任耶鲁大学校园牧师直至退休,不久卒于出生地匹茨堡。南京沦陷前,马吉牧师即领导教会在下关接待照顾前方退下之伤兵,每日千计。沦陷后,将自国军接收之伤兵医院改为难民医院,并任南京红十字会会长,设立粥场,救护难民。其所摄日军暴行照片发表于1938年5月16日之美国《生活》杂志。本书所复印者为其以日记体裁给其夫人费丝的信,1937年12月12日至翌年2月2日。

麦考伦牧师于1921年来华,历30年,足迹遍江南各省。战后负责教会复员工作,1951年离华。“南京大屠杀”期间,负责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即鼓楼医院)之管理与财务,有“粮食运送大使”之称。1995年上海所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日记并译成中文付印即为麦氏之日记。此日记在“东京审判”时予以引证。本书所取为其日记之全部。

威尔生医生出生于南京,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即返宁服务于金陵大学附属医院,“南京大屠杀”期间为两名留宁外国医生之一,但为唯一的外科医生,救活了千百名遭日军屠杀未死的难民,包括闻名海外的当时怀孕六个月,身受33刀的李秀英女士。其日记共51页,自1937年8月15日至翌年1月9日。本书选印其12月9日至次月9日之日记。

贝德士教授毕业于牛津大学,后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20年来华,执教于金陵大学历史系,历30年,于1950年返美。日军陷南京不久,被在上海的金陵大学董事会委派为金陵大学副校长(校长陈裕光赴四川成都,筹备金大在蓉复校),负责金大在宁校产。贝氏系对“南京大屠杀”最早提出抗议并揭露日军暴行者。本书选录其抗议函数通及控诉日本政府在宁贩卖鸦片及海洛因毒品的文章。

第三部分选载蒋公军医于1938年8月所著《陷京三月记》。蒋为我国近代军事家蒋百里之侄,军医学校毕业。北伐期间历任第二

师、第三师军医处长，以后悬壶沪上。抗战军兴，参加红十字会救护工作。10月应新任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医师电召赴京，参与该处筹办工作，遂任该处科长。南京沦陷后，金、蒋二人先避难于美国大使馆，后迁入金大难民营。于2月27日逃离南京。蒋抵汉口后所著《南京三月记》由张宗祥先生及金诵盘处长作序，为“南京大屠杀”宝贵文献之一。本书选录时，稍予缩减。

最后选载之文为王英女士所写之“难民营的生活”，王英和她的妹妹在南京沦陷前，在一医院充当助理护士，同入金陵神学院避难，以后王英在金陵大学内的诊疗室担任护士数月之久。1985年王英全家移民来美，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部分报道南京沦陷后“难民营的生活”，特此选录。

本书第四部分是“访问”。共访问四人，前三名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第四名是韩国“慰安妇”宋神道女士。若无前日本兵的作证，对整个大屠杀的认识不可能是全面的，纪录片《奉天皇之命》摄影队于1992年夏去日本，采访了三位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

第一个采访的是永富博道。永富在中学时代是一名受洗的基督徒。他说：“在那个时候，天皇制与军国主义教育正在盛行，所有日本人都奉命为侵华效劳，侵华战争被称为圣战。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把昭和天皇看作不仅是日本的，而且也是全世界的活佛。”永富入东京国史馆大学后，成为一个右翼学生，未及毕业，即于1936年受雇于日本特务机关控制之民间调查公司来华服务。南京沦陷后两周抵南京，正值日军强迫“良民登记”，成千上万人受骗承认曾加入国军或为国军服务，于是被拉往下关屠杀。永富同往并在下关亲手杀人。他说：“日本士兵在南京杀死的中国人有数万乃至数十万。”

第二位接受访问的日本兵是东史郎。他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第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第三分队的士兵。9月来华北，曾参加子牙河之役。该师团南调淞沪战场，于11月16日在扬子江浒浦镇登

陆，一路杀向南京。该师团于1937年12月22日接替第六师团，警卫南京，杀人之多仅次于第六师团。东史郎老年忏悔，发表其阵中日记，以《我们的南京小队：一名被征士兵对南京大屠杀的体验》为书名(1987年东京青木书店出版)。

东史郎的访谈有几点突出。他们这个小队到天津刚两个星期，在子牙河行军的时候，一群老人和妇孺共37人，一个一个的被他们刺死，其中有七岁的男孩和左右臂各抱一个孩子的母亲。第二，他们在进攻南京期间在各地纵火取暖。第三，为了“我们需要放心地睡四、五小时直到天明，我们常在睡前杀死当地的居民，确保他们不会向中国军队报告我们在这里睡”。第四，他们中队“原有士兵200人，但在作战时已损失了一半……我们90人要押送7300名俘虏”，后来把这批俘虏分配各部队杀死。第五，他在“下关看到大批尸体在江面上漂浮，它们全部肿胀起来。驳船不能系拢码头，因为浮尸堵塞了水道。”一名看守兵告诉他：“皇军把俘虏用卡车拖来，然后推入长江。我的责任就是射击并杀死他们。”最后，他到南京40天后，朝鲜慰安妇到达。来自日本天草地区的日本女人专为军官服务。许多朝鲜人还只是小女孩。在天津日本兵患性病的已有三千人，为此在天津建立一所专门的性病医院。

第三位接受访问的是上羽武一郎，他于1937年9月应征入第十六师团卫生队当卫生兵，参与南京战役。他的阵中日记和备忘录已编入下里正树所著之《被隐藏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所见之南京事件之真理》(1988年东京青木书店出版)。上羽揭露日军进攻南京路上强抓中国壮丁搬运日军伤兵及器材，时被杀戮。他对慰安所的情形有较详尽的报道，证实1938年1月慰安所已在南京设立。又日本人自小学时代养成崇拜天皇，瞧不起中国人之优越感，此种优越感二十联队官兵在占领南京后达到最高潮。

最后访问的是韩国妇女宋神道。宋是在16岁时被骗来中国充当慰安妇，在中国七年，尝尽作性奴隶的痛苦，四次怀孕，三次生育，一次是怀孕七个月，还被迫接客，致婴儿死于胎中。

本书最后部分是两件附录：(一)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1937年11月至1939年4月30日。本报告系由该会主席米鲁士牧师提出。1939年5月1日起该会主席为贝德士教授。(二)南京地区战争损失，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作者史迈士获得芝加哥社会学博士学位后，约于1931年来华执教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受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之托，史教授基于他参与巴克教授领导的1931年扬子江的水灾调查及1932年淞沪战争的调查的两次调查经验，率其助手作为期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6月15日）的调查。调查范围是南京市区及其周围的六个县，但其中两县即高淳及江北的六合，只调查一半。此附录系史教授原著的摘要。

最后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画册是由尹集钧、史编著，总编辑为龙多夫曼(Ron Dorfman)与史，责任编辑为秦凌，助理编辑崔秋香、邱苏道、吴永泉、周莲、广路，美术编辑窦东虹，美术设计为大中华杂志社。本书为中英文对照，先英文后中文。“前言”为大主教迪斯蒙·杜图所撰，再由余英时教授作序，然后由本书编者写“引言”。

内容共分八章，第一章为“通向南京之路”，第二章“南京的陷落”，第三章“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杀战俘”，第四章“惨无人道的杀人手段”，第五章“对妇女的奸杀暴行”，第六章“抢劫与纵火”，第七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第八章“不容篡改的历史和日本皇室的罪责”。余英时教授在序言中写道：

由于作者和编者具备了现代史学的批评精神，本书因此也获得不少新的发现。举两个例便足够说明这一方面的成就了：第一，通过仔细的时间推算，本书确定了主持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是日本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而不是被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第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一向很有争议。现在本书一方面根据新出资料，一方面根据屠杀前后南京人口的统计，彻底证实了三十五万的数字决不夸张，这个问题可以说已完全澄清了。这两点发现在日本侵华史上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本书同汤美如所编之“南京”一书显然有所不同，汤书可以说

是南京大屠杀的一个专题研究,以美国传教士遗存的原始资料为中心,加以访问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来证实原始资料所报道的南京大屠杀的正确。另一方面,汤书经编者有系统的技巧的编纂,并撰写经过深入研究的对每章所作的引言,使读者对所选录资料的了解更为确切,同时全书所载多为原始资料,可用于对南京大屠杀的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对于每章原文的作者本身及其所涉及的问题加以研究和发挥。

本书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图证》相比,则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书均对“南京大屠杀”作全面的报道,以图片为证,把当时屠杀的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真是铁证如山,使杀人犯惊惶失魄,使怀疑南京大屠杀者闭口无言,在图片方面已收广为包罗之效。本书所搜集之照片虽不如吉林人民出版社画册之繁多,但亦有后者所缺者,尤以对南京安全区方面之照片。两画册均达到以图证史之目的。

本书因系中英文对照,使西方读者有阅读的机会,增加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了解,截至目前为止,本书为唯一以英文对“南京大屠杀”作全面性的报道的书籍。再者本书用繁体字,使台湾及海外华侨青年易于阅读。本书的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和台湾及海外华人,与用简体字之主要以广大的大陆读者为对象当有差别。

笔者应在此特别指出者,本书印刷精美,设计新颖,图片制作之清晰醒目确实已达到完美之境地,较诸华盛顿“美国大浩劫纪念馆”出版之《必须让全世界知道!》画册,绝无逊色。由于三本画册的出版,我们可以“让全世界知道南京大屠杀!”

尽管这三本画册有无比的成就,但因其撰写的背景,取材涉猎的广泛及叙述这段史实的方法不同,难免有时挂一漏万或顾此失彼。因“南京大屠杀”多为世人所周知,如此三画册所引之证据,包括中、日、美、德四国之原件文件,不可不力求确实,以作向日本索赔的根据。为使“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更为正确清楚,笔者不揣冒昧,就其所知,将至目前阶段对有关“南京大屠杀”诸问题之研究成



果简述于后。

一、南京沦陷后的人口数目。南京陷前人口为一百万零数百人，中日资料皆吻合。南京市长马超俊于1937年11月23日致军事委员会函中称：“本市现有人口约五十余万。”金陵大学教授史迈士于其1938年6月出版之《南京战祸写真》一书中说：“一年前，南京市的人口恰好超过一百万，到八、九月份人口急剧减少，十一月初上升到五十万。”抽样调查的结果，南京市区内的人口得到二十二万一千余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当时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贝德士教授在其1939年初出版的《南京人口：职业收入与支出》小册中报道1939年2月南京市人口为342664人，与同月当地警察局人口统计相近。贝氏说：“我们1938年的调查，城内人口212600人之数字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之偏差。”因南京安全区的各种文件都证明安全区最多人口达25万人。当然大屠杀开始后数日，平民多逃入安全区，未及逃入者为数不多，但亦应有南京的人口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南京日本宪兵队1938年2月底的旬报说南京“复归”人口为335000人。

南京沦陷前的人口应包括(一)守城官兵约14万人；(二)常住居民35万人；(三)前线撤下伤兵2万人；(四)流动人口，前来避难者12万人，约共63万。当然这个数字不尽正确，但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二、日军进攻南京的人数。淞沪战役，日军所投入之军队远超过我们的估计或想像的数字。七七事变后，日本以北方为主要战场。8月15日松井石根被派为日本上海军总司令时，只辖第三第十一两师团。至9月20日华北日军为八师团，约37万人；上海五师团，约19万人。10月日本决定另组第十军辖三师团，野炮重炮兵一旅团，及国崎支队一旅团，后于11月5日在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登陆。及至日本华中方面军于11月7日成立，辖第十军及原上海派遣军，故其兵力达九个师团及国崎支队和从台湾派来之重藤支队(由重藤千秋少将所率之台湾守备队)以及“满洲国”军两旅，

实际人数已达 40 万人以上。日军进攻南京的军队为六个师团(第十三、十六、九、六、一一四及第十八)及天谷支队(属第十一师团)和国崎支队及伪军于芷山旅,应达 30 万人。其攻南京城部队为四个半师团(山田支队为第十三师团之第一三旅团),即第十六、九、六、一一四师团及山田支队。(第十八师团同于芷山旅攻芜湖,国崎支队由当涂之东过江攻浦口,天谷支队于镇江过江攻扬州,第十三师团主力于镇江过江经六合攻滁县。)其人数应达 20 万人。(以上资料系根据《日军对华作战纪要初期陆军作战: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台北,1987 年)。

三、守军人数。南京守军,除教导总队(步兵三旅九团,但第六、九两团开往江西补充新兵未回)约 3.5 万人及宪兵两团外,其他部队多由上海溃退之部队。另由武汉增援之第二军团徐源泉两师人,第四十一及第四十八师;广东叶肇之六十六军两师、第一九五及第一六师;七十一军王敬久之第八十七师;七十二军孙元良之第八十八师;七十八军宋希濂之第三十六师;七十四军俞济时之两师第五十一及五十八师;粤军郑龙光八十三军两师第一五四及一五六师;再有从守江阴炮台经镇江撤至南京之东北军第一一二师及黔军第一三师。这些队伍除俞济时之两师当有 1.7 万人,及有湖北新调来之徐源泉两师较为完整外,如宋希濂之第三十六师退到南京时只剩两三千人。第一一二师亦然。最精锐之教导总队是由原来一师之众扩充而成,已增添新兵六次。这些不完整的队伍放在一起,不超过 14 万人。宋希濂将军在其《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北京《文史资料》第十二辑)说:“保卫南京的总兵力约为十一万多人。”刘斐在其《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同上注)说:“共计达到十多万人。”守军只有炮兵两营和坦克车十辆,不仅在人数上较日军少很多,火力无法相比。日军每师团均有炮兵一联队(相当于国军的团单位);加以坦克车 200 辆,有无限制的飞机助战(由台湾出动飞机作战外,上海派遣军配有第三飞行团,辖四中队,飞机百余架);新组成之中国方面舰队原第三舰队及新编之第四舰队在长谷川清司令率

领下，溯江而上，11月30日中午已游戈下关江面。双方实力相差悬殊。首都南京之沦陷早在意料中，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四、日本大本营之设立。日本决定在华扩大侵略，乃于1937年11月17日设立大本营，日皇直接指挥海陆军（航空部队分隶海陆军）。“在日皇的轟下设置最高统帅部，称之为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及军令部总长（海军）应分别任于其幕僚，担任帷幄运筹之责，参与作战计划，为最终目的之达成”。11月24日，日皇亲自主持第一次大本营会议，有陆、海军大臣参加，但无首相及阁员参加。12月1日大本营颁布华中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次日，裕仁即派其叔父朝香宫鸠彦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原由松井石根兼任）。实际上，日皇间接指挥进攻南京之役。（见《日军对华作战纪要》，第588页。）

五、唐生智的休战与撤退。唐以带病之身，临危授命，于11月20日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24日政府明令发表）。战火逼进南京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即向唐提议与日军休战，以免南京毁于炮火，12月9日松井石根空投最后通牒，劝唐投降，限唐于10日正午答复。唐于9日派其秘书陪同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及长老会牧师米鲁士登停于下关美国炮舰巴奈号，请美国驻南京领事巴士敦设法与日军联络休战，同时电请在汉口之蒋介石（于12月7日清晨由京飞汉）批准休战，但为蒋拒绝，实非始料所及。惟10日晚，贝、米两人冒险再登巴奈号联络休战。11日巴奈号驶往上游，未再联系，翌日，被日海军飞机击沉。11日夜唐连接蒋两电令相机撤退。12日午后，唐请求安全区费吴生博士等向日方接洽暂时的休战，德大使波林先生愿持旗出城试探，但已经太迟了。

12日午后三时中华门失守，东面之中山门及西面的水西门岌岌可危。宋希濂之三十六师被调入城内，并在挹江门及下关戒严禁止各部队向下关撤退。五时，唐召集各师长以上会议，宣布蒋之撤退命令，决定当晚十一时开始撤退，分发各部队之突围路线，仅三十六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由下关渡江。但唐最后口授命令：八

十七师、八十八师、七十四军及教导总队诸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唐本人偕两副长官罗卓英、刘兴于晚九时始在下关渡江往浦口，并无仓惶逃跑之事。南京陷后，唐成为代罪羔羊，将南京战役之失败责任加于唐之一身实欠公允。（关于唐托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接洽休战事，见米鲁士遗稿，现存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南京撤退情形，请参看谭道平之《南京卫戍战》，已转载汤美如之画册；孙宅巍：《试论南京保卫战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载于《民国档案》1993年第一期；《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载于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37—47页；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三人对南京战役之回忆文，皆载于《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六、日军屠杀人數。首先，无可争论的，凡未逃出之国军几乎全部成为日军俘虏，临时逃避于安全区者后多被日军搜出，像俘虏一样加以屠杀。又我军在南京的保卫战中，死伤惨重。如12月8、9两日淳化镇之争夺战。五十一师之张灵甫团长重伤，五营官兵全部牺牲。光华门、通济门、中华门、水西门、中山门各地战斗激烈，五十一师程智团长阵亡于水西门，而守雨花台及中华门的八十八师死伤惨重，溃不成军。12日下午，“中华门及中山门城垣被敌人炮毁，敌军乘隙钻进，万千无秩序的士兵，自发的迎了上去，用自己的身躯阻敌人的长驱直入。我（谭道平）想，如果没有他们英勇的献身，南京的这次撤退是万万来不及的”。

从南京渡江撤出的军队至多不过两万余人：三十六师3千人，七十四军5千人，教导总队4千人，及第二军团1万人。突围成功的有粤军第八十三军及教导总队第三旅，不超过1万人。总共3万余人，其余10万人的下落不外死伤，被俘，和事后被搜查出来而遭屠杀。

日军于1937年12月发表南京之役“中国军的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名，俘虏达数千名”。翌年1月又估计“中国军的损害（伤亡者）约八万名，其中遗弃尸体约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四名”。当然上

述数字都是夸张的。但是,从日军伤亡的数字也可反映中国军方的可能伤亡。1938年2月1日出版的《日本国际画报》中,日军公布的《南京攻击战况统计报告》称:“日军损失是死伤共计约四千八百人,战死八百,战伤四千。中国军战死八万四千,被俘一万零五百。”

从最近发表的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十九名的日军《阵中日记》,我们可得知日军死伤的严重情形。日军占领南京后数日,第十三师团于20日全部过江。于12月26日在滁县镇(浦口西北安徽界内)举行师团“慰灵祭”,发表该师团战死2577人,马1200匹。第六十五联队于12月29日举行联队“慰灵祭”,师团长前来参加,公布联队战死者679人,负伤1400余人(显然的此数字包括自上海战事结束后的死伤,但以进攻南京为主。见小野贤二、藤原彰、本多胜一编:《皇军士兵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录》,东京大月书店,1996年3月出版)。最保守的估计,日军在南京之役死伤达两万人。国军伤亡亦应在两万人以上,被俘与伤兵被屠杀者达9万人。日军太田寿男少佐供称:在他同安达少佐负责投入长江,烧毁及掩埋的10万人中,重伤和濒死者有4200名,这正是国军被捕的伤兵。

战后复员不久,南京地方法庭在首席检查官陈光虞主持下,于1945年11月初,由14个机关团体成立调查敌人罪行会。已有相当成绩,已得到一可靠之数字,即为敌人惨杀者为二九五八八五人,其后救济总署加入对被害人家属予以救济,因之续有数百户人民申请救济,由此续得一统计为九六二六 人,共计三十九万余人”(见《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录》,载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538页)。

为配合“东京审判”,蒋介石面谕南京临时参议会会议长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副议长陈耀东等于1946年6月初成立“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动员全市力量,作为期3月的重新调查,于11月11日宣布结束。已调查有确实人证之案件共2784案;已查获有结果的案件共1848案。除将调查报告送呈蒋介石及有关机关外,并转中国驻日检查官向哲浚,即请引渡南京大屠杀首犯松

井石根及主要凶犯谷寿夫、中島今朝吾及柳川平助等来华受审。

主要是根据这两次的调查报告,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7年3月10日判决谷寿夫死刑。判决书之一段:“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具。被屠杀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陈光虞检查官两次提控的屠杀人数的第一次43万人,第二次50万人,再根据南京临时参议会的新调查报告,及很多人证物证,乃于1948年11月4日宣布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的判决。其中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上段判决有两点必须指出:(一)最初六个星期内,被屠杀者达20万以上;(二)此数字不包括投入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在内。

1956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沈阳审判1062名日本战犯前,南京市政府奉命再度作“南京大屠杀”之调查。1982年日本篡改教科书,激起南京大学及南京市各团体再一次作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当时南京市还有仍健在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一千七百余,对他们作了访问调查,再次肯定南京大屠杀遇难军民34万人,其19万为集体屠杀,15万为零星屠杀。这些都是估计累积的数字,难求精确,应该是最正确的数字,现已无法再作像过去四次的调查,当然是不能变更的。

### 七、屠杀命令的由来。

第一,对于几万俘虏或几万平民的一次或短期内予以屠杀,即需要详尽的策划,也需要有组织地动员很多日军来处理。

第二,屠杀大批俘虏不仅发生在第十三师团,同样发生在第十六师团和第六师团,这两个师团均杀人最多,而第九及第一一四师团甚至连在芜湖的第十八师团也不例外。例如众所周知的“百人斩”的向井敏明和野田岩两少尉是第十六师团,而以其“勳广”宝剑屠杀我三百余俘虏和平民的田中军吉大尉则属第六师团。

第三,上海派遣军第十三师之两角部队(即六十五联队)在12月13、14两日在幕府山获得中国俘虏14777名。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

第四,12月17日松井在南京举行入城典礼,而在幕府山被俘的数万俘虏是17日晚才开始在江边被第六十五联队屠杀。这可以当日“投降军临时代表”给日军的呈文为证:

我们离了队伍投到大日本军队缴枪,希望给我们一个安置的办法,但是到了此处已有三天,究竟有没有办法处置(我们)数万可怜的人。饿了四天多了,粥水都没有半点食,我们快要饿死了。在这生死的顷刻中,要求大日本来拯救我们数万人的命。”(见小野贤二前引书,第251—252页)。

这数万俘虏就是在17、18两天晚上在江边屠杀的。18日在南京下关的10万以上尸体还在处理中。松井大将于19日登南京市西北之清凉山,以望远镜远眺,江心洲、下关、浦口尽入眼帘,他如何能错过在他眼前的上新河、汉中门及下关各地成千上万的尸体(见吉林人民出版社之画册第57页)。而“南京大屠杀”在17日入城典礼后日益加剧,直到他2月7日第二次来南京后情形始有改善。正如史迈士教授当时所写“松井来京下令禁止暴行迟了两个月”。

日军之进攻南京虽然是日皇裕仁所批准,亦由于松井之不断倡议“膺惩”中国,打下南京,推翻蒋介石,使中国屈服有关。他屡次下屠杀命令。11月7日即给在沪西昆山之第六师团命令:“不论妇

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12月7日松井之《南京城攻占要领》中令：“各师团以步兵一联队为基干的部队扫荡城内。”（按：扫荡和纪律肃正都是“屠杀”之意）。12月11日以后松井之方针：

决定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围，将抗日军人及抗日爱国中国人从东、南、西、北四方加以包围，逐次压缩包围圈，以实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杀。（见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分队长中野忠之寿供词，载吉林人民出版社画册第30页。）

第十三师团六十五联队远藤高明的12月16日阵中日记：“俘虏总数一七二五名。傍晚军命令将三分之一俘虏引至江边射杀。”（见小野贤二前引书，第219页。）

第五，两位军司令官，上海派遣军朝香宫鸠彦及第十军柳川平助，均曾下达屠杀令，再由师团长下达至联队长。松井在京沪线及南京所贯彻的屠杀政策或曰恐怖政策当然是得到大本营的暗示和许可，也就是日皇的暗示和许可，否则为何对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不停的抗议置之不理？休论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向军部提出的警告了。因美国庇护头号战犯日皇裕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有判决松井石根为南京大屠杀元凶正法了。

八、史无前例的奸淫。东京审判判定：“自军入城后的一个月之内，强奸中国妇女达两万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两万起强奸事件。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说过：“从一九三八年二月六、七号直到那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和估计，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不下8万人之多（见加加美行、姬田光义译：《证言，南京大屠杀》，东京青木书店，1986年，第53页）。

南京大屠杀期间，负责管理金陵大学附属医院的麦卡伦牧师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曾在东京审判法庭上被朗读：

谈这样可怕的事情，我真不知如何从头说起。我从来未听到过，也没有读过这样残忍的事件。强奸！强奸！强奸！我们估计每夜最



低限度有一千件，白天也很多。如果有反抗或表示反对，则偿以刺刀或枪弹。

贝德士教授也说三分之一强奸案发生在白天。金陵大学神学院索奈教授于1938年1月16日给在美国休假的毕范宇博士信中说：

南京几乎成为活地狱，没有地方，没有人是安全的。日本兵喜欢甚么就拿甚么，不要的就破坏，公开的并在众目之下强奸上千的妇女和女孩……在圣经师资学校的一名逃难女孩遭日兵轮奸十七次。最后我们请来日本卫兵把守各大校园的大门（当时圣经学校住难民四千人，神学院住三千一百人），但是他们自己常进去强奸妇女。每天白天晚上发生无数的强奸案。（原函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李克痕在其《论京五月记》中说：据估计在南京三分之二的妇女被日军强奸。1938年6月1日《新新新闻》报道：南京妇女，自九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倘被捕获，几无幸免。”

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也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小女孩或老年的妇人，多数被奸污。”说被奸污者达8万人，可谓保守的估计。

九、南京大屠杀的时间。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说：据贝德士博士作证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但是，贝氏在作证时也说：“屠杀一直延续到1938年夏季。”

德国驻南京大使馆代办罗森博士于1938年2月10日给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的分析日军暴行：

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三万尸体，这都是大恐怖时期集体处决的。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五百至六百具。

圣公会牧师福尔斯特在他的家信里说：“每次驻南京的日军换防，便掀起一阵强奸浪潮，使南京的妇女们感到极大的恐惧。”华群

教授在她 1938 年 3 月 15 日的日记写道：“昨晚日本兵在附近民房找‘花姑娘’，附近年轻女士跑到金女大宿舍避难。”又报道当日她同米鲁士牧师去访问住南城的两位妇女并摄影：昨夜那位四十八岁的妇女被日军轮奸十八九次。她的七十六岁的老母亲也被强奸两次。”

最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发现的“南京安全区档案”的日军暴行案例 11 件(第四六—四七 件；按过去所见案例至第四四件为止)。今抄录三件如下：

第四六三件：三月十八晚八时左右，五名日兵着蓝黄色制服到门西的蔡家。两名士兵在外看守，三名入内要钱。全家跪下求饶。三个兵放一个木梯在房门前，用绳子把主人的两手绑到梯子上，把他悬在空中。他们开始搜索房内，拿走一个五元钱的钞票，一枚十分钱的日本铜币，三个中国的两毫钱，一个纸币和一个铜币；翻箱倒柜后，他们拿走一件皮袍，一件女人的冬装，和一架留声机。临走的时候，他们在蔡的大腿上刺六刀，在他的两臂砍两刀，最后向他的头上射一枪，他当即死去。他们也对正在地上跪着的蔡丽时(蔡妻)的头上刺几刀和刺姓王的大腿两次，然后扬长而去。

第四六六件：三月十七日晚十时，六名日兵到住在后戟门(音译)年四十岁的一位姓高的老农民家里，要求高给他们找几个女人。他回答说，他一个女人都没有，同时也无法找到女人。他们对他身上和脖子猛碰很多次，然后用刺刀砍他的头。他奔向房门，遂即倒下流血不止，未再站起来即死去。日兵看他死了，他们很快离开。

第四六七件：三月十九日，在午后三时半到四时的中间，一名日兵在金陵大学语言学校的难民营里强奸一名十九岁的女孩。贝德士博士(按：贝氏自 1920 年以来访问日本多次，并在哈佛大学进修日文一年，故略通日语)于四时零五分赶到那里。当他走近那名日兵时，他挥动刺刀无礼的说“要姑娘”。贝氏劝他离开。这名士兵并无喝醉酒的迹象。

请再看 1938 年 5 月 13 日华群教授的日记：

今天听到两起惨案。几乎每天都听到使人心碎的惨案。

不怪人们极其可怜的问你：“这样可怕的日子还要继续多久？我们能承担得了吗？”

毋庸置疑的，“南京大屠杀”从日军入城开始，继续到翌年3月下旬，为期三个多月。1938年5月20日逃离南京的林娜在《血泪话金陵》里写道：“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时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来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埋葬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因此时疾丛生，不死于屠杀下，也要死于时疫。”

再者，各慈善团体的掩埋记录，也多少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时间。1937年12月22日开始掩埋工作的红十字会到1938年10月30日为止，共掩埋43123具尸体。3月掩埋8396具，4月3132具，5月924具。南京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马吉牧师，副会长许传音博士，该会3月份掩埋3980具尸体，4月份848具，5月份300具。掩埋尸体最多的是崇善堂。该堂虽早自1937年12月26日即开始掩埋尸体，但其工作于翌年3月后才开始积极。3月掩埋3417具，4月至5月1日止掩埋104718具。

曾任国军第一三师医务主任的陈宏医师，于1938年夏始逃出南京抵汉口。他接受记者访问说：“南京敌军的大屠杀，继续了七个月，现在总算比较好了一点，但是奸淫劫掠的事情，还是常常发生的。”这完全符合贝德士教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所说：“一直到夏天还有很多暴行发生，只不过不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罢了。”

十、南京安全区。缘于法国饶神父(Jacquinot de Besange)于1937年11月在上海设立由西方人监督之难民区，收容难民45万人，并得日军松井司令的认可的成功先例，决定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们乃发起南京安全区之设立，于1937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得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大力支持，拨大米3万担，面粉1万袋及法币8万元。更于12月1日将南京市政管理委托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过渡时期全权处理警察、公用事业、消防、房屋管理、卫生、

及粮食供应。该委员会将成立经过通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请予认可,但未得回答。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委员 15 人组成,德国三人,英国四人,丹麦一人,美国七人,公推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兼纳粹党驻京支部书记拉贝(1882—1950)为会长,美国长老会牧师米鲁士为副会长,金大史迈士教授为秘书。

安全区占地 3.26 平方公里,约为南京城八分之一的土地。安全区内初设难民收容所(或称难民营)20 所,由青年会领袖费吴生博士主持,华群女士辅助之。华女士管理的金女大的妇女难民营于 12 月 8 日开始收容第一批女难民。到 11 日只住了 850 位妇孺,华女士就不禁觉得她原计划收容 2700 名难民是估计错误。15 日清晨,大批妇孺涌入金女大,次日,难民人数增至四千余,远超过计划收容人数。17 日后再增至 1 万人,因过于拥挤,很多难民站立数日,难得一卧。17 日后,安全区人口爆满,难民营增至 25 所,安全区人口最高时为 25 万人,其中有 7 万人全靠安全区接济得以生存。安全区设三大粥场,每日施粥两次达两月之久。日军宣布 1938 年 2 月 4 日为限期,难民必须返家。安全区也鼓励他们回去,结果凡年轻妇女返家当天几乎皆遭日军强奸,次日即返难民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 1938 年 2 月 18 日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原会长拉贝离京经沪返国。新会长为索奈教授,不久由米鲁士接任(米任会长至 1939 年 4 月,再由贝德士担任会长达两年之久。)难民营逐渐缩减。3 月中旬,金女大难民营尚有难民 3310 人。最后的四个难民营于 5 月 21 日结束,但金女大尚有 800 青年妇女无家可归,仍留住校园,由华女士开班授课,至秋季始结束。

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有密切联系的是先已存在但重新改组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马吉牧师为会长,两位华人为副会长,秘书为福尔斯特牧师,德人科鲁格先生为财务。其他 12 名委员中包括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如拉贝、贝德士、史迈士、米鲁士及两名美国留京的医生及华群女士等。该会接收在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伤兵医院,成立红十字会难民医院,收容千余名重伤伤兵。以后这

个医院配合金陵大附属医院是南京沦后唯一的两所医院，拯救了很多被日军屠杀未死的平民。

安全区不仅拯救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和千百妇女免遭日军蹂躏，还间接的阻止日本在南京恐怖政策的继续和减轻日军的暴行。这二十几位西方人在日军屠刀下，为人道主义所作的表现和伟大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他们成功的因素很多，首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选德国人在南京的领袖纳粹党南京支部书记拉贝为会长，以其特殊身份易于对日本驻京大使馆和日军办交涉，这不仅因为德国纳粹是法西斯日本的盟友，那当然是重要的因素，在心理上日本人素以德国为马首是瞻，在科技上，在军事上，甚至明治的宪法和“天授民族优越性”无不效法德国的。最重要的是，这十几位献身宗教事业的美国学者牧师和医生，他们冒生命的危险，来保护安全区的难民，不断向日本大使馆及日军提出抗议，并向美国政府及公众揭露日军暴行，呼吁立予制止。那时的日本人是忌恨美国人，把美国作假想敌人的，但是日本人又素来是“软的欺、硬的怕”的，还是不敢惹美国人的。当然，这些美国人的处境也是很危险的。他们抱牺牲的决心可见史迈士教授于1938年3月8日寄出的信中极其感人的一段：

一天晚上，情况最险恶的时候——松井胜利入城典礼后的两天——住在我们房子的伙伴们在晚饭桌上说：“我们头一个被杀的人，我们将把他的尸体抬到日本大使馆。”好几个人跟着说：“好！我愿意作被抬的人或是作抬他的人。”每晚，医生便当了我们的家庭的妈妈，每晚各处寻视看我们八个人是否有不在的。他说：“他从未相信我们都能活过来！”真的！我们都活过来了。最坏的是在爱立生（美国领事，于1938的1月27日在日本宪兵司令部被打一耳光）事件之后，麦卡伦的脖子挨一刺刀擦伤。

当我们数十万男、女、老、少同胞被日本人的铁蹄驱入他们制造的人间地狱里，他们齐跪求饶，但松井石根大将和他的每个士兵都无动于衷，使他们陷入绝望的境地，安全区的国际人士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希望和救星。日本人蓄意制造了亘古未有的最残暴悲惨

的“南京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章。当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丧尽了人性的时候，更显示了这些国际人士的“舍己为人”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性，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曙光和希望！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为中日两国子子孙孙的前途，并为我 34 万死难同胞伸冤，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必须向犹太人学习，他们遭受纳粹德国的浩劫“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也要把法西斯日本给我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让全世界都知道！

写于 1996 年 美国

(作者单位：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

(责任编辑：刘兵)

---

## 读《南京大屠杀图证》

高兴祖

---

1995 年，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南京大屠杀图证》(以下简称《图证》)，收入了相当丰富的图片，尤其是近年来日本方面所刊布的有关图片和证言，并附有说明和考证性文字，充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有组织地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暴行。《图证》首次系统地公布了我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档案。它是中国公开出版的比较完整的南京大屠杀图片专集，出版以后，受到很大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

但是，也许由于出版时间匆促，整个看来，这一著作似乎还比较粗糙，还有一些不够正确的地方。在《图证》眼看就要出版发行之前，我曾有机会看了一遍清样，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但由于时间太紧，不能细细考订，有的只提出了请编者再查阅一下有关资料的意